

MDSXLYDS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与当代社会主义

张凌云 著

MAKESI DE SHEHUI XINGTAI LILUN YU
DANGDAI SHEHUIZHU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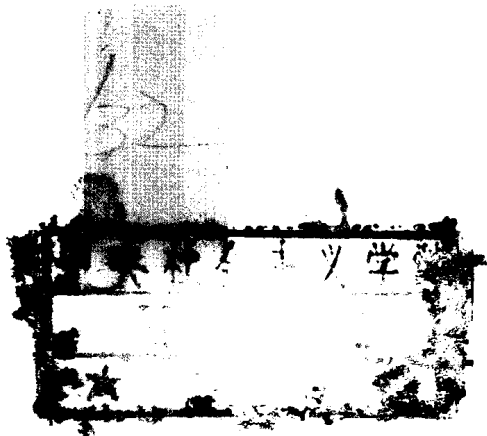
武汉出版社

201900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与当代社会主义

张凌云 著

MAKESI DE SHEHUI XINGTAI
LILUN YU DANGDAI
SHEHUIZHUYI



201019600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张凌云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9

ISBN - 5430 - 1872 - 1

I . 马… II . 张… III . ①马克思主义 - 社会形态学 - 研究
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研究 IV . D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324 号

书 名: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

著 作 责 任:张凌云

责 任 编 辑:张建平

封 面 设 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42176 82839623

印 刷:孝感市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8.375 字 数:140 千字 插 页:5

版 次: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 - 3000 册

ISBN7 - 5430 - 1872 - 1/D·169

定 价:1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言

周积明

据报道,王蒙不久前在国外的一次演讲中,盛赞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完全赞同这一说法,因为,这一结论不仅被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验证,而且体现于我案头的一部书稿上。

置于我案头的书稿书名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正如书稿的“引言”所论:“本书研究的这个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似是一个不必再研究的问题。它在我们的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一直有明确的结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依次演进的理论,当代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即是取代资本主义而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然而,作者却对这一“不必再研究”、“一直有明确结论”的问题,提出质疑,并加以再讨论,此种情形在以往是不可想

象的。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进步。

本书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五形态论”，通常被称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历史的误解。本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只是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到了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的论述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其一，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变成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其二，马克思的“大体说来”被上升为人类社会演进的“普遍规律”，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每个民族，都要经历这五种社会。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联共（布）党史》中的一章，自此，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被“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作为金科玉律规范前苏联人的社会历史观达半个世纪之久。尽管马克思早在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就曾强调，如果把他研究西方社会演变得出的结论上升为一般社会发展理论，那将“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但历史偏偏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中国人主要是通过苏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因此具有浓厚的苏俄色彩。“五形态说”从 30 年代起就盛行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中自是十分自然的事。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导论首先把“五形态论”作为“社会发展之一般”的法则加以阐述，然后“根据这个缩写，回头来看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序”^①。以“五形态论”为指导，郭沫若“天才地一个一个地解开了那些古代的神秘的谜”，从而最终证明了：“我们中国”典型地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同样，郭沫若的奴隶制研究，亦是要以此论证“五形态论”的普遍性，他的结论是：“关于奴隶制这个问题，我敢十二分坚决地主张，中国也和希腊、罗马一样，对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③。尹达先生曾简明概述郭沫若史学研究的立场：“如能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证实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那也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谛”^④。问题在于，郭沫若要去努力证明的“五形态论”并非马克思在普遍意义上提出的社会形态理论，更重要的是，

①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卷 1，第 18 页。

② 《沫若文集》卷 16，第 27 页。

③ 《沫若文集》卷 11，《羽书集·驳〈实庵字说〉》，第 429～430 页。

④ 尹达：《郭沫若》，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4 月出版，第 1419 页。

由于郭沫若把“五形态论”的证实与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凡是不同意“五形态论”的人,都不免有几分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普遍性的色彩。当时主张“中国没有经过奴隶制”的一派便大多被作为托派看待。1949年后,“五形态论”更被定于一尊,凡稍有异议者,必被视为异端,痛加挞伐。1957年,雷海宗、李鸿哲等学者就因为不同意“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便被作为右派批判。与此同时,一大批学者用各种方式来论证“五形态说”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如郭沫若于1952年出版《奴隶制时代》,再次强调了“五形态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令人窒息的“文化一律”的氛围,并不能泯灭思想者的思考。1974年8月,正当“批林批孔”运动鼓噪一时,顾准拖着低烧咯血的身体,啃着冷馒头,写下了《关于海上文明》一文。文中写道:

埃及、巴比伦等所谓“东方”,没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古典的即奴隶制的(注意,马克思用“古典的”一词,指历史的古典时代,即希腊盛期和共和罗马时代,包括奴隶制和奴隶制还未发展起来的“公民城邦”时代)、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个亚细亚的。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取消“亚细亚的”这个范畴,恩格斯

做了一小部分工作，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不准谈“亚细亚的”，于是对马克思，亦即对历史的强奸完成了。……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①

这是何等了不起的理论勇气。顾准对“五形态论”的挑战以及他在阴暗年代写下的一系列追求真理的文字，生动表现了“人是会思考的芦苇”的命意。芦苇很脆弱，很容易折断，顾准在写了《关于海上文明》后不到4个月就因病早逝，极有力地印证了生命的脆弱性。但是，顾准的思考——独立的思考，决不媚俗的思考，却又使他的生命具有一种坚强性和永恒性，这就是这个世界亘古不变的法则。

德国诗人歌德曾经睿智地指出：一切倒退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当中国历史终于脱离了“主观”

^①《顾准文集》，第285～28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一批相当著名的学者，在政治风潮中无法逃避“媚俗”这一人性弱点。如郭沫若作《春雷》一首呈毛主席，把批林批孔称为“春雷”；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批孔文章，被《北京日报》、《光明日报》转载。冯友兰先生后来在《三松堂自述》中，以一位哲学家的气度沉痛回顾这段经历说：“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只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这一段令人难以忘记的历史，一方面显示了顾准当时的理论勇气是何等难得；另一方面也表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对“媚俗”的剖析，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与价值。

的轨道,进入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前进上升的时代,“五形态论”的“普遍性”开始遇到公开诘难。1988年陈剩勇在《史学理论》上发表《社会五阶段演进图式:向唯心史观的复归》,文中尖锐指出:“跨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中国并没有经历过奴隶占有制经济居主导或支配地位的奴隶社会,封建制度瓦解以后的中国,也没有导入资本主义轨道,而当代人置身的社会主义中国更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五阶段单向演进图式之于中国,正如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的铁床,活生生的历史被斩头去尾地填入这一主张假定的模式之中。长期以来学术界面临的哲学贫困、史学危机、经济学僵化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都与这张普罗克拉斯提斯式铁床有关。”1990年,吴于廑先生经过多年酝酿,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上发表了题为“世界历史”的总论,文章以人类历史的多线演进道路为依据,犀利有力地揭示了“五形态论”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的无限尴尬:

亚欧大陆各农耕中心进入阶级社会,在世界上历史上划分奴隶制阶段和封建制阶段,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许多专门研究可以看出,古代世界物质财富直接生产者被奴役、被剥削的方式;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包括残余的原始公社共有制,不同的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完全不自由

的奴隶、半自由的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以及自由劳动者在各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各地区也不一致。这种情况,在普通历史书上,古代历史是这样,中古时代也是这样。因此,前资本主义的两种阶级社会……都很难以某一地区的历史实例作为典型;……而且,古代社会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与中古时代封建制度下的依附农,往往不易分清界限。……各种劳动者所占的比重……也是这样。……这就使得……区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成为十分复杂的问题。一般的方法是以五世纪划限,把早于此限的纳入奴隶制,晚于此限的纳入封建制。看来,这种方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除欧洲古典制的一些中心而外,这种划限的方法很难说明……为何同一依附劳动者和自由劳动者在同一时期打上奴隶制的烙印,在另一时期又涂上封建制的色彩。^①

进入 90 年代后,对“五形态论”提出挑战的论著日益涌现。如冯纲著《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1992)认为,马克思从未试图建立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发展的“五阶段模式”;刘启良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1994)确认: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东西方双线发展论而非“五形态论”。我案头的张凌云先生的著作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第 8 页。

也是其中一本。书中对“五形态论”及其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代表了当前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前沿性的理论思考。新近由一批中青年学者编纂的《中国大通史》更是径直宣布:“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①毫无疑问的是,有关“五形态论”的讨论并未最后终结,人们还将有不同意见要发表,有种种复杂的问题要清理、要明辨,但无论如何,这些讨论都将只会在学术的范畴中进行,不会再有人因为批评或坚持某种见解、某种主张而身遭不测。讨论的基点也将不再是从经典到经典,从思辨到思辨,而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实际进程。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思想解放、学术突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中国学术一百年来一个重要历史进步,它体现了当代学术文化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前景,也体现了我们时代的不朽光辉。

在向“五形态论”提出尖锐挑战的同时,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提出新的见解,不少学者倾向认为马克思主张的是“社会发展三形态”。他们的依据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分为三个社会形态。“人的依

^① 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形态”。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拜物教”一节中,马克思又把《手稿》中提出的“三形态论”简明地概括为:直接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自由人的联合体。“三形态论”的主张者确信:“‘三形态说’是唯物史观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高高树立起的一个里程碑。”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仍然坚持“五形态论”,认为“五形态论”是成熟的,“三形态论”是不成熟的。还有些学者则试图在“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如认为两者之间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包容。而主张包容说者又有“五形态论”为主、“三形态论”为从;或“三形态论”为主、“五形态论”为从的论争。十分感谢张凌云先生,他在他的书稿中对如上极为复杂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清晰的探讨,而这些富于新意的探讨无疑是这部书的理论贡献之一。

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本世纪20~30年代曾有一次国际性的大讨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拉狄克、瓦尔加、马扎尔、哥德斯,日本的服部之总、森谷克己、羽仁五郎、伊豆公夫、

平野义太郎、相川春喜、早川二郎、秋泽修二等一大批著名学者都卷入其中,分歧极大。在中国学者之中,郭沫若先生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原始公社社会,其后又变其说,认为“卡尔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洋的社会’是等于‘家长制’氏族财产形态”;王亚南相信: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尚未充分觅得其他一切社会全都经过此种历史阶段的证迹以前,姑先将大体已经知道的中国、印度或亚细亚的原始体制,作为古代社会所由导出的前一阶段”;李季以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氏族社会的承继者”,中国的夏殷两代便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时代”;杜畏之批评郭沫若“机械地固执了一种死的成见方式”。在他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同是氏族社会瓦解之后出现的几种并行的经济形态,而中国历史上并不曾有过这种生产方式;胡秋原肯定地说:“如果有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它就是专制主义的农奴制。”如上大相径庭的见解,深刻表明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和诠释,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理论问题。1979年的《历史研究》曾刊载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问题的问题》。如今,近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涵仍然未能在学术界形成较为接近的看法,可见所谓“不成其问题”之说,未免太为轻率。张凌云先生的书稿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慎重的探讨,虽然,他的研

究并不能使这一问题得到最后解决,但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进一步走向深入。

有关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不能不涉及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当代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问题,也涉及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其强烈的现实性显而易见。作者认为,马克思在晚年设想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较之《哥达纲领批判》所设想的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后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要更具现实性;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足可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相提并论的一大贡献。我相信,作者的以上论述不仅仅来自于书斋中的理论思考,而且更植根于对当代社会主义无比生动的历史和现实实践的总结和提炼。

凌云先生的这部书稿虽然颇有价值,但出版甚不顺利,幸得武汉出版社社长兼武汉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彭小华先生的慷慨支持,书稿终于付梓。我在为凌云先生衷心高兴的同时,对彭小华社长以及武汉出版社深怀敬意。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学者们的辛勤努力,而且必须得到出版界的有力支持。只有学者和出版界联手,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术文化的宏大

殿堂。多年来,武汉出版社为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为武汉地区的学者做了很多事,对此,我和我的师长们都是不会忘记的。

一部真正凝结了学者理论思考和学术探索的著作的出版,总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可喜可贺之事。我祝凌云先生继续努力,有更多精彩的作品献给我们这个时代。

1998年10月于水果湖寓所

目 录

序 言	周积明(1)
引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基本划分	(3)
一、马克思的生产力社会形态理论	(4)
二、马克思的交换社会形态理论	(8)
三、“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关系	(11)
四、驳所谓“三形态论”“不成熟”说	(18)
第二章 马克思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	(22)
一、第一时期:《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时期(40 年代)	(24)
二、第二时期:《资本论》创作时期(50 ~ 60 年代)	(27)
三、第三时期:“人类学笔记”创作时期(70 ~ 80 年代)	(33)
第三章 “五形态论”及其普遍性问题再探讨	(43)

一、《序言》的概括能否作为“五形态论”的 根据	(43)
二、驳所谓“五种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是马 克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概括出来的”	(48)
三、“五形态论”并不符合东方各国的历史	(52)
四、“五形态论”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 态理论“正宗”的原因	(66)
五、斯大林对“五形态论”与《序言》的概括 关系问题的态度	(70)
第四章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72)
一、简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	(72)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历史过程	(76)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逻辑叙述	(84)
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及其未来 发展的两种可能性	(95)
第五章 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的理论	(103)
一、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原意 ...	(103)
二、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根据 ...	(123)
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与东西方双 线发展	(130)